

拉丁美洲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

刘 承 军

自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实证主义曾在拉美一些国家思想界居主导地位。但是,在当时,它并不是唯一的思潮。随着实证主义的衰微,其他西方思潮已经流入拉美,并且其影响逐步扩大。

19世纪晚期,德国哲学家卡尔·克劳瑟(1781~1832)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传入拉美,它反对经院哲学和实证主义,宣扬神秘论、祖国、理想、人的自由意志、艺术的生命力等观念。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哲学曾影响了拉美实证主义后一代知识分子。他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发,否定经院哲学和实证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绝对化理论,提倡新的形而上学,传扬“新的生命感”,认为“功利是一种价值,但把它看作唯一的价值是荒谬的”;“当代的命题是使理性服从于生命力”;“生活应该文明化,但文明必须充满生机”。他充分肯定“自发性”、“个性”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倡导文化的多元论。

除上述两种流派外,还有来自法国的本格森主义、来自意大利的克罗齐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德国唯心主义流派。到1910~1930年,流行于拉美的西方思潮已不再是实证主义,而是一种自由哲学。

在拉美推行实证主义的过程中,有过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造就出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接受了新的哲学,提出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思想。其中有些人原先是实证主义者,例如墨西哥的胡斯托·谢拉(1848~1912)和秘鲁的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1848~1918)。他们肯定精神的作用,强调立足于本国国情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着意创造新型文化。我们把这种新思潮笼统地称为文化民族主义。

在这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乌拉圭思想家何塞·恩里克·罗多(1871~1971)于1900年前后提出的“爱丽尔主义”,墨西哥思想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1881~1959)于1925年前后提出的“宇宙种族”论,阿根廷思想家阿莱杭德罗·科恩(1860~1936)的“创造性自由”论,阿根廷作家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1874~1938)的传统主义以及古巴思想家何塞·马蒂(1853~1895)的革命民族主义思想等。正象实证主义在传播中形成了一些知识分子团体一样,新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团体。例如,1907年成立的“墨西哥协会”(最初叫“报告会团”)和1918年成立的阿根廷“九百年代学院”(指自1900年开始的年代)。

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观点

一、对文化与进步的反思

历史发展揭示出的实证主义文明观和进步观的缺陷,引起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全面反思。他们认识到,物质的繁荣并不等于文明的实现。阿根廷思想家保罗·格罗塞(1848~1929)针对本国的现代化趋势提出,“在一个没有理想的国度,一切民族繁荣都建筑在沙滩上。”秘鲁的普拉达说:“没有正义、怜悯和仁慈,就没有文明;哪里宣布以‘生存斗争’为社会法则,哪里就由野蛮统治。”

与此同时,新一代知识分子提出了自己的文明观。罗多1900年发表的《爱丽尔》代表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他在宣言式的著作中,以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形象“爱丽尔”表现有灵感的高贵精神,以“卡列班”体现粗俗的物欲和肉欲。他试图以希腊人关于美的理想和基督教的慈悲心理为核心,把无私的知识“精英”塑造成民主制度下的领导阶层,从而创造出高等文化。罗多在谈到《爱丽尔》的创作动机时说:“启发我写《爱丽尔》的主要有两种感情:其一是我对于精神生活和对于属于精神生活的艺术生活的酷爱,这种爱引导我与某些功利主义及平均主义倾向进行斗争;其二是我对于本种族的激情和我作为拉丁人的激情,它推动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即必须使我们的人民保持根本的集体天性,抵御一切同化和侵略的企图。”罗多并没有否定物质进步的作用,但他倡导超越物质目标。他的口号是:让卡列班服从于爱丽尔,让爱丽尔引导卡列班。在这种思想激励下,许多知识分子试图以自己的行动教育全社会,并对此充满信心。乌拉圭思想家、作家卡洛斯·巴斯·费雷拉(1873~1958)在《知识分子的道德》中倡导每天躬身自省那些与己无直接关系的事,作为个人的精神修养。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多揭露不道德现象,具有道德色彩。

巴斯孔塞洛斯是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主要有两个理论:“宇宙种族”论和美学一元论(或称形而上唯美主义)。他提出人类社会有三个发展阶段:物质的(尚武的)、知识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美学的)阶段。人的生存也有对应的三种方式,它们分别属于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范畴;美学阶段是最高级的文明阶段。拉美人应该尝试建立一种“不仅是功利,而更应该是美”的社会。巴斯孔塞洛斯曾受过东方思想的影响。他反对过分颂扬欧美工业化进程,强调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发展教育、推行土改。他甚至说:“尘世的进步只是一种过眼烟云”。他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而且在出任墨西哥革命政府教育部长时还大力推行教育、文化改革,实践他的理论。比如,他曾在教育部增设主管学校、图书馆和艺术的三个部门;组织出版、发行大批从字典到古典名著的人文学科书籍;组织培训印第安人等。

在上述思潮中,卢贡内斯的思想也很独特。他提出人生的根本奋斗目标在于争取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自由应该是受个人意识驱使的行为,而不是法律规定的结果。他认为,一个有能力写出自己的史诗的民族与取得科学进步的民族一样值得称颂,因为艺术和科学同是将野蛮力转化为理性力量的标志,因而也都是进步的标志。他认为,法律规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但却压抑了个人自由。“民主不是目的,而是通往自由的过渡手段”。

从上述文明观出发,新一代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了拉美大陆的文明阶段。墨西哥思想家安东尼奥·卡索(1883~1946)认为,文明和人的幸福是观察问题的两个不同角度;两者相比,后者更为重要。因此,“我们的祖先实行过活人祭、有过野蛮的、封建的社会组织,他们不如我们文明,却比我们幸福。”普拉达提出,印加帝国的文明程度并不比西班牙殖民时

期低；在殖民时期，印第安人的道德状况比以前更糟。还有一些知识分子重新点燃了“新大陆”的思想，认为新大陆注定要产生一种高于现存西方文明的、更加符合人性的文明。

二、提倡创造性

为了寻求新的文明，新一代知识分子号召摒弃模仿，弘扬创造性。马蒂说：“人们意识到模仿得太多了，出路在于创造。创造是这一代人的口号”。科恩提出，纯粹的客观现实是不存在的，人对现实的认识是人的意识的产物，人类的斗争不是为生存，而是旨在争取自由，人类文化应该表现为创造性的自由。

这种创造性的思想包含了拉美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精神。1908年，在海德尔堡召开的世界哲学年会上，秘鲁哲学家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1834~1905）提出了拉美人的理想主义天性，并引证了许多拉美哲学家的理想主义成份。卡索提出了著名口号：“只有在趣膀上压上铅块，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它的含义是理想主义应与现实主义结合。他认为，法律负有双重使命，它一方面约束现实，一方面追寻理想；立法者的使命就是在法律的实施中逐步体现它所追求的理想。

新一代知识分子不仅宣传创造的重要性，而且认为拉美民族有充分发扬创造性的天然条件。这种条件就是拉美历史上形成的种族融合。它使拉美民族创造出最具独创性的文化。巴斯孔塞洛斯提出的拉美民族将成为“宇宙种族”，就是这个含义。

三、发扬民族主义精神

新一代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创造性蕴藏着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当然，这种民族主义主要不是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而是指文化上的，即充分发挥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更高级的文化。

新一代知识分子从生命发展规律的角度阐述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卢贡内斯说：“真正的创造就在于组织构成一个活的机体的各种成分”。这就是说，真正的创造在于使自身的优势得以发挥。他还说：“生活的成功在于使行为适应本质，每个人和每个种族天生负有某种使命，他（它）不能回避也不能取消这个使命，我们的解放者有一句名言正是这样说的：完成你应该成就的事业，否则，你将一事无成。”多米尼加学者恩里克斯·乌雷尼亚（1884~1946）指出，世界趋同性不应抹煞民族特性：“世界性并不等于种族特性的灭绝。……单一性是苍白无力的帝国主义的理想，它永远是不可取的。”罗多在分析美国文化的缺陷和弊病的同时，也指出美国人的历史是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他们忠于自己的信念，创造出符合本民族天性的文化，这是美国文化的活力所在。言外之意，拉美人如果单纯模仿，绝不会有所造就。

从上述思想出发，这一代思想家提出了研究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任务。阿根廷思想家里卡多·罗哈斯（1882~1957）曾受政府委托访欧，但他在访问归来，却发表了“民族主义复兴”的讲演。卢贡内斯认为：“研究本民族的传统并不是为了囿于其中，而是为了发现进步的规律，这一规律将向我们揭示生命如何在逐步提高的阶段里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研究和发掘本民族文化传统方面，新一代知识分子致力于发掘本民族历史上的伟人，撰写伟人文集；创办杂志，广泛宣传、保护和发扬现存拉美文化；著书立说，介绍拉美优秀作家和知识分子。

一些人努力从民间文化传统中发掘本民族的精神力量。卢贡内斯和罗哈斯都曾做过大量宣传,赞誉阿根廷草原混血居民高乔人。卢贡内斯称高乔人集中体现了阿根廷人的一切美德,何塞·埃尔南德斯的历史长诗《马丁·菲耶罗》就是阿根廷人民的民族史诗。

也有一些人努力从印第安文化中发掘振兴民族文化的因素,尼加拉瓜著名诗人鲁文·达里奥(1867~1916)很早就意识到印第安神话的美学价值,他在《中美洲的民间文化》中阐述了这一思想。以伊尔德勃兰多·卡斯特罗·波索(1890~1945)为代表的秘鲁知识分子则深入研究了印加文化,试图借鉴印加人的原始共产主义生产、生活方式解决当代问题。波索在《我国的土著村社》中指出:“土著村社保留了两个伟大的社会经济原则,即多样的劳动合同办法和以较少的生理消耗,在愉快、竞赛和亲密友爱的气氛中实行这种合同。”

在发掘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新一代知识分子必然把注意力转向农村文化,因为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正是农村文化较多地保留了反映民族感情和传统价值观念的生活模式。这种倾向体现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阿根廷作家阿尔贝托·赫尔丘诺夫(1884~1950)在《犹太高乔人》中描写了一批定居阿根廷农村的犹太人,把他们作为现代化潮流中暴发户的对立面加以讴歌。文学家们还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理想。如奥古斯托·达尔马和费尔南多·桑蒂万两位作家,办了一个托尔斯泰式的农庄,亲身体验自己不熟悉的劳动生活。

新一代知识分子努力发掘和传播民间艺术。他们认为艺术是保存、延续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纽带。卢贡内斯说:“美不是一个随时代变化的思想、道德概念,而是一种永恒的冲动,它表现出持久的偏好。因此,美是种族延续的基本纽带。”巴斯孔塞洛斯在任墨西哥教育部长时积极扶持民间艺术,关心民族音乐的创作,组织本国艺术家以传统壁画装饰公共建筑物,推动著名的墨西哥壁画运动。在振兴民族艺术的热潮中,拉美大陆的一些艺术家逐渐得到国内、外的了解和重视,如巴西音乐家H·比拉一洛沃斯的音乐创作、墨西哥的壁画,都在欧洲获得很大成功。

随着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探讨,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考虑作为母国文化的西班牙文化。阿根廷哲学家萨乌尔·塔沃尔达(1885~1944)提出,人并不只是一个种族概念,而且是精神生活的产物。他试图以西班牙和意大利传统来解释拉美历史。卢贡内斯认为,希腊文化是真正代表诗人和英雄的文化,西班牙文化是希腊文化的最好继承者;西班牙人与摩尔人的战争、征服新大陆的业绩都是希腊文化精神的表现。拉美人,如阿根廷的高乔人所继承的正是这支血脉。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和墨西哥学者阿方索·雷耶斯(1889~1959)成为著名的西班牙文化学者。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同一倾向,如乌拉圭小说家卡洛斯·雷伊莱斯(1868~1938)的《塞维利亚的魅力》(1922),阿根廷作家恩里克·拉雷塔(1875~1961)的《唐·拉米罗的荣耀》(1908)。达里奥在“乐观主义者的致意”一诗中鼓吹光荣的“拉丁时代”就要到来。秘鲁诗人何塞·桑托斯·乔卡诺(1875~1934)在诗集《美洲魂》(1906)中赞美了美洲精神与西班牙精神的共性,并以怀旧的笔调回顾了殖民时期的秘鲁生活。同时,西班牙方面也作出了反应。西班牙历史学家拉斐尔·阿尔塔米拉(1866~1951)在奥维多大学的赞助下访问了拉美,回国后提出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庞大计划。

新一代知识分子还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提出,只有真正了解国情,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针对前一代实证主义者的缺陷,卡索提出,“真正的拯救者不是对脚下的土地一无所知的幻

想家,而是善于将现实与理想结合成和谐整体的圣哲”。马蒂以更明确的语言提出一系列治国主张。他认为:“所谓治理就是使一个国家内各种自然成分达到平衡”;“在美洲,优秀的统治者不是那些知道德国人或法国人怎样统治的人,而是那些了解自己国家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是那些了解如何引导本国人民,以产生于本国的方法和机制达到目标的人。”

在一些拉美国家发生的某些大的社会动荡使一代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加速了对本国国情的了解,担负起振兴本民族的重任。例如,玻利维亚在1932年至1935年间经历了一场与巴拉圭的战争,从这场战争中诞生了“大厦谷战争的一代”。这一代人的成长导致1952年玻利维亚革命的成功。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1918年的阿根廷乃至拉美大学改革运动都曾起到过类似的作用,如大学改革运动曾造就了著名的秘鲁“美洲人民联盟”等民族主义政治组织。

文化民族主义是一条出路吗?

研究拉美文化的当代美国学者琼·弗朗哥曾指出过爱丽尔主义在拉美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民族主义超越了单纯的政治领域,产生更深刻、广泛的含义;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促进了拉美一体化进程。这一总结基本适合于对整个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评价。然而,这种评价也表明,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并不是解决拉美问题的根本出路。

首先,许多思想家意识到,这一思潮忽略了现实阶级斗争的存在,忽略了政治、经济对于文化的重要限定作用,实际上,文化民族主义试图在文化上为拉美政治、经济问题寻找一条出路。但是如果过分相信和拘泥于文化的措施,往往会在严酷的现实阶级斗争中碰壁,并逐渐受到政治的摆布。古巴思想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1881~1969)针对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种族”论指出,文化融合有其积极作用,但巴斯孔塞洛斯忽视了阶级斗争的现实,对西方文化没有采取分析、批评的眼光,最终,这种理论很容易为本国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20世纪初,卢贡内斯、罗哈斯等人鼓吹高乔文化的做法得到阿根廷统治者的积极支持,但后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外籍移民蜂拥而入的情况下保持国内统一的稳定局面,并不可能真正关心以高乔人为代表的被压迫阶层的利益。在另一些情况下,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会受到右派保守势力的利用。这个问题随着各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越来越被人们察觉。到70年代,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以更严厉的口吻谴责文化民族主义。墨西哥著名记者卡洛斯·蒙希瓦伊斯曾指出:“我们所见到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上面所规定的。它曾是一种统一全国的口号,是通过法令建立起来的国内联系。”实际上,一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在不同程度上把民族主义变成空洞的口号,掩盖本国的阶级矛盾。

文化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弱点是它所暗示的精神贵族、精英文化倾向。罗多的爱丽尔主义就有这类倾向。秘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1894~1930)指出“宇宙种族”论者的救世主态度。这种精神贵族倾向很容易使这批知识分子脱离广大群众,在黑暗的现实和困难面前丧失勇气,使其主张流于空谈。巴斯孔塞洛斯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他曾踌躇满志,为创造新文化殚精竭虑,但终因不合政治时宜遭到冷落。1927年,他在一批年轻的文化精英支持下竞选总统,败在政客手下,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了

秘鲁前总理梅尔卡多·哈林谈拉美形势

1990年5月6日秘鲁前总理、秘鲁地缘政治和战略研究所所长埃德加多·梅尔卡多·哈林少将和前渔业部长哈维尔·坦塔莱安在拉美所同拉美所研究人员和中国拉丁美洲学会部分会员座谈拉美形势。

哈林认为,近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苏联已不再是一个经济技术大国,但仍然是军事大国。美国已恢复经济大国的地位,但它已不能再充当国际宪兵。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已进入一个长期缓和时期。国际格局已从两极朝多极方向发展,形成美、苏、中国、日本和欧洲五极。

世界形势的变化对拉美产生深刻影响。东欧国家政局的变化和德国统一的进程,使西欧、美国和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向东欧国家转移,使拉美、非洲国家受到损害。

美国企图将墨西哥纳入美、加大市场,使墨西哥更加依附美国,从而淡化墨西哥传统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美国先后抛出的贝克计划和布雷迪计划主要是针对墨西哥的。去年年底美国入侵巴拿马得手后,力图牢固控制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因为这一地区对美国安全十分重要。美国继续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在尼加拉瓜建立了一个较亲美的政府。美国对古巴进行威胁,企图孤立古巴。对南美国家,除扫毒计划外,美国缺乏明确政策。美国以扫毒为名,想从军事上控制南美一些国家。

安第斯地区一体化进展缓慢。但是,阿根廷和巴西的一体化取得了重大进展,随后乌拉圭也加入阿、巴一体化进程,其中巴西受益较大。玻利维亚在安第斯条约组织中获益不多,现正向阿、巴一体化接近。智利新政府尚未拿定主意:是回到安第斯条约组织,还是加入阿、巴一体化。

拉美8国集团自1987年成立以来已开过5次会议。其宗旨是排除美国,由拉美国家自己来商讨解决所面临共同问题的办法和协调共同的利益。最近一次8国集团会议决定同美国对话,但美国企图把8国集团纳入美洲国家组织,表示只同拉美各国进行双边会谈,避而不同8国集团谈。

墨西哥。事实上,这一代知识分子后期普遍感到理想幻灭。罗多本人曾在给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1864~1936)的信中表示,只有在欧洲才有可能享受真正的精神生活,在拉美这样落后的大陆,高尚的精神生活只是一个幻影。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失望情绪。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加尔维斯(1882~1962)在小说《形而上之弊》中总结了本国的国民生活,小说主人公在文学上的种种努力丝毫没有改变严酷的现实。小说人物的失败经历多少体现了爱丽尔主义的失败。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属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开始感到威胁。墨西哥作家马里亚诺·阿苏埃拉(1873~1952)在小说《下层人》以及阿格达斯在《青铜种族》中都反映了这种情绪。爱丽尔主义中的乐观情绪曾代表了一代人的精神风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乐观情绪逐渐为普遍的悲观失望所代替。

与此同时,另一批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接受新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1904年,普拉达提醒知识分子摆脱贵族立场,不要再充当引路人,应该和工人群众站在一起。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加入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运动,其中巴西诗人奥拉沃·比拉克(1865~1918)的宣言很具有代表性。他在宣言中表示欢迎俄国1905年的“杜马革命”。这一行动象征着知识分子已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本文主要参考书目转第47页)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问题。由于上述情况,中美洲国家的农业生产势必受到严重影响。

五、面临的问题

劳动生产率低和出口农产品产量的难以提高,是中美洲出口农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据美国国际开发署估计,如果中美洲各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为100,那么农业部门只有50左右。尤其严重的是,在1960~1980年期间,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一直未见明显增长。此外,由于土壤肥力的减退以及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的侵袭,许多出口农产品的产量长期难以提高。如在哥斯达黎加太平洋沿海地区,病虫害几乎毁灭了所有的香蕉树。

从外部条件来看,中美洲国家的出口农业同样面临着严重困难。首先,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不是坚挺,而是疲软。其次,国际市场对中美洲国家农产品的需求量难以出现大幅度的增长。有些农产品的出口市场甚至有所缩小。例如,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市场对中美洲蔗糖和牛肉的需求量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第三,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不断加剧。近年来,一些加勒比和南美洲国家也在努力扩大农产品出口多样化,而且主要向美国出口。因此,中美洲国家必须在产品质量和价格方面提高竞争力。

尽管中美洲国家的出口农业面临着一系列不利内外因素,但是中美洲地区的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历史传统以及它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中美洲国家应继续努力发展出口农业。改变以农产品出口为基础的单一经济结构固然非常必要,但是,在外汇收入来源有限、制造业部门发展迟缓的条件下,通过扩大农产品出口收入的途径来达到增加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进口投入(如资本货、中间产品和科学技术等)也是切实可行的。当然,中美洲国家在进一步发展出口农业的同时,还应加强工业部门的建设,并正确处理粮食生产与出口农作物生产之间的关系;此外,为减缓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冲击,还应积极发展农产品出口多样化,挖掘林业和渔业部门的出口潜力。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上接第61页)

主要参考书目:

- 莱奥波尔多·塞亚选编:《当代拉丁美洲思想界先驱》,墨西哥公共教育部1919年出版。
吉·弗朗哥:《拉丁美洲现代文化》,墨西哥“华金·莫尔蒂斯”出版社1971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辑:《拉丁美洲的思想》,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86年。
弗朗西斯科·拉罗约:《伊比利亚美洲哲学》,墨西哥“波鲁瓦”出版社1978年。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我们时代的主题》,西班牙“卡尔佩·埃斯帕萨”出版社1961年。
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杂文集》,阿根廷“阿吉拉尔”出版社1962年。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
约翰·斯基刘斯:《二十世纪拉丁美洲杂文选》,墨西哥“经济文化出版社”1981年。